

战略

- ◎三千年战略运用的成败
- ◎最高统帅的战略较量

- ◎重大战略决策的前因后果
- ◎古今中外战略的经验教训

刘建◎著



中国经
济出版社
CHINA ECONOMIC PUBLISHING HOUSE

战略

刘建◎著



中国经济出版社
CHINA ECONOMIC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战略 / 刘建著. -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5. 1

ISBN 7-5017-6736-X

I. 战… II. 刘… III. 军事战略-世界

IV. E8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111555 号

出版发行：中国经济出版社（100037·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北街 3 号）

网 址：www.economyph.com

责任编辑：张淑玲 王晓东（电话：13910084005）

E-mail：zsl8838@sina.com

责任印制：张江虹

封面设计：中子画艺术设计

经 销：各地新华书店

承 印：三河市欣欣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690mm×1000mm 1/16 印 张：41.5 字 数：810 千字

版 次：2005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200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7-5017-6736-X/Z·819 定 价：48.90 元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举报电话：68359418 68319282

服务热线：68344225 68353507 68341876 68341879 68353624

序

由于工作比较忙，写作此书断断续续用了将近 10 年时间。通过对战略问题较长时间的研究和思考认为，学习研究战略不能成为玩弄概念的游戏，也不能成为空洞的高谈阔论，更不能成为烦琐的纸上谈兵，学习研究战略是为了更好的运用。为此，此书按照历史发展的时间顺序，将 3000 年以来古今中外著名战争的战略运用，最高统帅的战略较量，重大战略决策的经验教训融为一体作了叙述。每一篇都相对独立，都叙述了一个相对完整的战略运用过程。这样研究叙述，便于找到和表达战略运用最一般的规则。在分析论证时，尽量做到客观、公正，用历史事实说话；在引用权威的史料时，尽量引用原文，摘要作者的大意力求准确无误。

由于本书研究和表述战略运用的方法是一种新的尝试，难免有不妥之处，欢迎批评指正。

作 者
2004 年 8 月 1 日

目 录

最好在敌人危机的顶点发起战略决战	1
政治旗号可以掩盖战略图谋	7
战略离不开诡计	12
越是形势大好越不能忽视潜伏的战略威胁	17
利用战略要害以点制面	22
实施战略分割打碎完整的战略体系	28
越是处理紧迫战略问题越是着眼全盘	34
战略步骤一步顺则步步顺	39
占据中央地带左右战略势力分化组合	44
分散是战略的大忌	49
把战略决策的负面影响消除在萌芽状态	54
在优势对比发生根本转变后再发起致命的战略打击	61
能以小见大战略决定才果断	66
政治决策不能不考虑战略后果	70
战略重在谋势	76
抓战略要害不能主次不分	82
制服特殊的对手必先创造特殊的战略条件	89
战略先机一步抢先则步步抢先	96

战略见识越高胆略气魄越大	104
顺应力量消长的趋势确定战略步骤	112
越是在情见势竭的战略关头越敢于出奇制胜	118
善于韬光养晦战略力量才会由弱变强	125
局部行动即使再合理也不能损害战略全局	133
利用矛盾和失误使战略行动由难变易	141
战略是统筹全局的艺术	147
取或舍的战略选择以坚持战略大方向为准	154
抓住对手的特点把握由强转弱的战略时机	162
战略隐患即使再小也不能有丝毫的忽略	166
谨防一种战略倾向掩盖另一种战略倾向	172
忽视致命弱点的战略极其危险	184
战略最怕权力斗争干扰	189
巧妙确定战略打击次序迅速推动全局进展	194
战略越积极主动就越能应付意外	201
优先提高作战效率获得一个时代的战略优势	206
没有重点就等于没有战略	212
忽视致命战略隐患胜得越快败得越惨	218
创造条件的过程越曲折决定性战略行动就越顺利	231
谁能选定战场谁就能操纵全局	236
战略不拘泥于常理	242
抓住有决定意义的问题采取战略措施	247



战略的奥妙在于集中兵力	255
对进或停作战略选择不能一意孤行	269
不自觉的战略行动要适可而止	278
不明白战争的实质就不能作战略决策	286
主要兵力的投向决定战略的命运	293
夺取决定性战略部位瞰制全局	303
政治方针决定战略方针	311
战略绝不能脱离政治	318
战略错误可以导致政治错误	323
战略计划绝不能超过实际作战能力	341
造成决定部位兵力优势是夺取战略主动权的关键	351
在最后的战略关头疏忽大意必定功亏一篑	357
战略反攻从最薄弱的环节突破	366
有复杂的派系就无集中统一的战略指挥	372
战略发展方向取决于政治方向	390
军事战略不能破坏政治条件	401
战略要便于创造和利用所有有利条件	413
战略模式最怕生搬硬套	422
战略大方向不变绝不排除小方向变化多端	431
扭转灾难性战略方针从首脑人物着手	439
维护战略安全不能嫁祸于人	452
战略灵活性以获得最大利益为准	467



静止防御战略必定忽略反击能力	476
寓深远战略用意于眼前交易之中	481
判断战略进攻时间宁愿靠事实而不靠推理	489
力量对比的变化是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的主要依据	498
战略就是用决定性力量控制决定性部位解决决定性问题	507
战略进攻前面阶段越顺利决战阶段就要越慎重	546
战略反攻要敢于在决定性部位冒险	553
战略判断的理由不能来自固有的观念	559
越能抓住战略弱点就越能把握战略机遇	566
在消除一种战略风险时不能忽略另一种战略风险	578
判断对手动与不动不能忽视战略关系的实质	587
变首战为决战在于一举摧毁战略反击能力	595
军事战略既解决军事问题也解决政治问题	602
摆脱战略被动要有很强的战略反击能力	610
判断战略盟友不能不懂战争的政治含义	617
进行战略判断最怕观念陈旧过时	624
战略进攻样式扬长避短出其不意	640
战略论	650



最好在敌人危急的顶点发起战略决战

(一)

约公元前 16 世纪，在中国夏朝最后一个国王夏桀统治时期，统治阶级残酷剥削压迫人民，社会矛盾尖锐化，人民反抗激烈，商部落首领汤乘机灭夏，建立商朝。汤在位时间较长，商稳定发展，周围小国大都尊商为共主。当时，产生于夏朝末期的周族姬姓部落也臣服于商，活动于今陕西、甘肃一带，并逐渐发展壮大起来。当商朝第二十传国王盘庚时，约公元前 13 世纪，商朝经约 300 年的发展，雄居于中原地区，国力和军力有很大的优势。为摆脱自然灾害和社会动荡不安，盘庚迁都于殷即今河南省安阳市小屯。商朝第二十二传国王武丁，为巩固和扩大统治，不断对西北和北方的方国和部落用兵。与此同时，周族至第九传首领周太王，逐渐发展壮大，对商朝时叛时服。

商朝王位传至文丁时，周族王位传到了季历（周太王的幼子）。当时，商朝开始衰落，周族则正在兴起。兴衰更替的发展趋势，标志着商与周之间的融合与斗争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石声璧说：

季历继续执行周太公“遗道”，笃于行义，获得了附近部落的拥护，季历和商朝贵族通婚，积极吸收商朝文化，促进了周族社会的发展。在商朝的支持下，季历对邻近的戎狄部落发动进攻，取得了很大胜利，周的势力得到了巩固和发展。周族统治者也增加了大量财富和奴隶，地位越加显赫。商王文丁封季历为“牧师”，即商朝在西方的方伯。周族已经成为商朝西方一个强大的方国了。由于周族统治者的日渐强大，加剧了他们和商王朝的矛盾。商文丁为了遏制周族的势力，杀了季历。季历之子姬昌继立。^①

当商朝王位由文丁传至帝乙时，姬昌出兵讨伐商朝，没有取胜。于是姬昌变公开反商为臣服事商，明里仍把周当成商的附属国，暗中却发展扩大势力，与商朝周旋。当时，江淮之间的夷人已强盛起来，帝乙多次对夷方发动战争，虽取得一些胜利，但未能彻底解决问题。帝乙末年，商迁都于沫即今河南省淇县朝歌。

约公元前 11 世纪，商朝经历 17 代 30 王，王位传至第三十一王帝辛即纣王。纣王统治下的商朝潜伏着内外交困、两面受敌的严重危险。首先，商朝统

^① 《中国军事史·兵略》上卷，解放军出版社 1986 年版，第 18 页。



治层腐败，大失人心。司马迁说：

帝紂资辨捷疾，闻见甚敏；材力过人，手格猛兽；知足以距谏，言足以饰非，矜人臣以能，高天下以声，以为皆出己之下。好酒淫乐，嬖于妇人，爱妲己，妲己之言是从。于是使师涓作渐淫声，北里之舞，靡靡之乐。厚赋税以实鹿台之钱，而盈钜桥之粟。益收狗马奇物，充仞宫室；善广沙丘苑台，多取野兽蜚鸟置其中。慢于鬼神，大聚乐戏于沙丘，以酒为池，悬肉为林，使男女裸相逐其间，为长夜之饮。百姓怨望而诸侯有畔者，于是紂乃重刑辟，有炮格之法。以西伯昌、九侯、鄂侯为三公。九侯有好女，入之紂。九侯女不慧淫，紂怒，杀之，而醢九侯。鄂侯争之强，辨之疾，并脯鄂侯。西伯昌闻之，窃叹。崇侯虎知之，以告紂，紂囚西伯。西伯之臣闳夭之徒，求美女奇物善马以献紂，紂乃赦西伯。西伯出而献洛西之地，以请除炮格之刑。紂乃许之，赐弓矢斧钺，使得征伐，为西伯。^①

其次，商朝统治集团内部存在深刻的矛盾。紂王专制擅权，重用小人，不听劝谏。紂王“用费中为政，费中善谀，好利，殷人弗亲。紂又用恶来，恶来善毁谗，诸侯以此益疏”^②。紂王作为帝乙正妻的少子继承王位，帝乙长子微子启因生母出身卑微未能继承王位，一直耿耿于怀，这就在上层埋下了分裂的种子。

再次，当时紂王面临两个强大对手，一个是东南的东夷，另一个是西面正在崛起的周国。这就使商朝可能面临两面受敌的形势。加上商朝周围还有其他几十个方国和部落，一旦商在外交上失利，就可能陷入被动。

(二)

尽管紂王面临潜在的严重危机，商仍是最强大的国家。经过十几代人的努力，商不断兼并领土，向外扩张。到紂王时，商王朝统治区域，以殷为中心，包括今河南北部、河北南部、山西西部和南部；其文化所及的地域更加广大，南面已达今湖南衡阳、宁乡和江西清江等大江以南地区，北达今辽宁、内蒙等地区。商王朝靠扩大统治区域，掠夺大量财物，抢劫众多奴隶，具有雄厚的国力和军力。紂王还组建庞大的军队，常备军在3万人左右，战时动员奴隶，军队人数可达十几万人^③。加上商代后期畜牧业和手工业进一步发展，商朝军队的战车和武器装备也处于领先地位。西周和东夷与之相差很多。

正因为周文王姬昌看破了商朝强大与虚弱的两面性，才决心推翻商朝，但不急于求成，先壮大自己，削弱商紂，再给其致命一击。在西周步步进逼的形

^① 《史记·殷本纪》。

^② 《中国军事史·兵略》上卷，第15页。

^③ 《中国军事史略》上卷，第49页。

势下，商纣对所面临的危险，缺乏足够的警惕和预防。石声璧、司马迁说：

姬昌被释放回国后，任用熟悉商朝内部情况的贤士吕望。当商纣王全力经营东南、无暇西顾的时候，周文王姬昌与吕望便趁机迅速发展经济、政治和军事力量，对商王朝都城朝歌，采取进逼政策。文王采纳了吕望的意见，表面上对纣王采取恭顺的态度，以欺骗纣王。纣王因此对文王放松警惕。文王在以“刑”控制人民的同时，实行德政和“裕民富国政策”。文王还礼贤下士，广罗人才。并能分化瓦解商朝的附庸，河东许多小国，纷纷归附。文王姬昌在相继灭黎、灭邘、灭崇之后，周人势力东达江淮之间，南及汉江，西南深入巴蜀，南方大部分邦国、部落归服于周。当时，周人已三分天下有其二，构成了对商都朝歌钳形包围的态势。为了继续向东发展，文王把政治中心从“岐”迁至沣水西岸的丰即今陕西省长安县西北沣河西岸马王村、西王村一带。

西伯滋大，纣由是稍失权重。王子比干谏，弗听。商容贤者，百姓爱之，纣废之。及西伯伐饥国，灭之，纣之臣祖伊闻之而咎周，恐，奔告纣曰：“天既讫我殷命，假人元龟，无敢知吉，非先王不相我后人，维王淫虐用自绝，故天弃我，不有安食，不虞知天性，不迪率典。今我民罔不欲丧，曰：‘天曷不降威，大命胡不至？’今王其奈何？”纣曰：“我生不有命在天乎！”祖伊反，曰：“纣不可谏矣。”^①

文王始终没有把推翻周朝当作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他从各方面努力，注重打好基础，积蓄力量，多种手段并用。通过文王的努力，西周急速壮大起来，特别是在人心向背的政治基础和与东夷遥相呼应的战略形势上，已胜过商纣。这为对商朝最后一击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然而，文王姬昌未来得及完成推翻商朝的大业，在迁都丰邑的第二年死去，这一历史使命就落在姬昌之子姬发的肩上。

(三)

在西周步步进逼的形势下，纣王以集兵田猎的方式炫耀武力，震慑周人。由于西周进逼恰好是东夷与商朝作战之时，所以纣王已经陷入两面受敌的境地。当时，纣王的主要兵力在东线，全力攻击东夷各部。由于东夷地域广阔，实力较强，牵制纣王很多兵力，作战持续了几年时间。虽取得一些胜利，但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尽管对东夷作战，使商军掠夺大量财物，虏掠大量奴隶，但也陷入东夷战场而不能自拔，消耗大量人力、物力和财力，使商纣开始面临全面危机。

^① 《中国军事史·兵略》上卷，第18—22页；《史记·殷本纪》。



姬发即位后为周武王，以太公吕望为文武师，以周公姬旦为辅，继承周文王的遗志，举起讨伐商纣的大旗。当时，需要周武王作出的一个重要战略决定是，何时发起对商纣致命一击。为了选择最佳决战时机，武王发起“观兵孟津”的行动，石声璧说：

为测验各方部落对讨伐商纣的态度以及检阅军队完成作战准备的程度，武王祭祀文王姬昌后，利用文王在诸侯中的崇高威信，表示自己继承文王遗志，于即位后的第二年，载文王灵牌于东中，与太公吕望一起，率军东下，观兵孟津（今河南孟津东北），有八百诸侯前来参加。武王宣布说自己是受先王之命为讨伐商纣的统帅，然后开始军事演习。吕望宣布演习的行动和作战纪律，部队遂分批开始渡河演习。登岸后，八百诸侯和部落首领都宣誓愿接受周武王指挥，并一致要求立即北上，讨伐纣王。^①

在武王“观兵孟津”时，商纣面临的危机还未发展到顶点：虽兵陷东夷，主力部队仍在；虽陷入孤立，仍为最大强国；虽矛盾重重，还未分崩离析。纣王刚愎自用，不听劝谏，自以为是，骄傲轻狂，面对复杂局面和严重危机，很容易出现失误并促使内部矛盾激化。商纣面临的危机正在迅速发展。

在商纣面临的危机正在发展时，诸侯提出与之决战的建议。武王通过分析形势和双方优劣对比认为，虽然西周和诸侯可以发起决战，但商纣还未被充分削弱，而其危机正在发展，与其以劣势兵力与商纣硬拼，莫如待其进一步削弱后，摧枯拉朽，一举定乾坤。因此，武王对诸侯说：“汝未知天命，未可也”^②，便命令诸侯率军各归本国，待机而动。“观兵孟津”后，商朝统治集团内部矛盾激化，危机进一步加深，出现严重分裂局面。司马迁说：

纣愈淫乱不止。微子数谏不听，乃与大师、少师谋，遂去。比干曰：“为人臣者，不得不以死争。”乃强谏纣。纣怒曰：“吾闻圣人心有七窍。”剖比干，观其心。箕子惧，乃佯狂为奴，纣又囚之。殷之大师、少师乃持其祭乐器奔周。^③

商朝高层混乱、分裂、自耗的局面，正是周武王所预料和耐心等待的机会。但是，武王认为危机仍未发展到顶点。关于武王作出发起战略决战的决策过程，石声璧说：

自武王“观兵”西归后，为了进一步了解商朝的情况，以便确定发动战争的有利时机，不断派出间谍到朝歌进行刺探。当纣王进一步迫害反对他的贵族时，间谍回报说：“谗慝胜良”。武王认为时机仍不成熟。后来又得到“贤者出走矣”的报告，武王认为时机还不成

^① 《史记·周本纪》。

^② 同上。

^③ 《中国军事史·兵略》上卷，第24页。

熟，最后得到“百姓不敢怨诽矣”的报告，武王这才确认纣王已众叛亲离，与之进行战略决战的时机成熟了。在“孟津之誓”之后不到两年（约公元前1027年）的十二月，起兵袭击朝歌。^①

(四)

周武王洞悉了战争的实质。一场改朝换代战争的胜负，不仅决定于军事，而且决定于政治，人心向背是决定因素。当商纣的政治危机还未达到顶点时，周武王宁愿缓一下。急于求成可能取得军事胜利，难以取得政治胜利。

周武王窥破了商朝统治层内部斗争激化的趋势。随着商朝内外危机的不断加深，企图挽救商朝的贵族，必定要有所作为，而纣王不容他们，必将加速分裂；上层的分裂，势必加剧国内混乱局面，引起人民的不满。周武王看到这种分崩离析的局面正在发展，宁愿缓一下，顺其自然，让其内耗不断加重。如果急于求成，反而可能使其内部矛盾缓解下来，造成困难和被动。

周武王看准了纣王的战略失误。自从西周崛起，商就面临东夷和西周两个对手。纣王对周疏于防范，专顾东夷，致使商与东夷两败俱伤，周则坐收渔利。周武王宁愿缓一下，让双方互相削弱。若急于决战，势必促使纣王舍东夷而专顾西周。

由此可见，周武王决定缓一下决战，反而大大加重了商纣的全面危机，对商纣一方的战略损害极大，对周方的战略利益极大。而且这种战略利害的消长，是在周方不费吹灰之力下达成的。在对方危机达到顶点时发起战略决战，就像制服狂奔的烈马一样，既不费力穷追，也不冒险阻挡，而是等到它精疲力竭时，不用费多大力就会很容易制服。这表明，3000多年前的周武王很有战略才能。关于牧野决战，石声璧说：

约公元前1027年，周武王为统帅，吕望为军师。率戎车300乘、虎贲3000人，甲士4.5万人，挥师东进，大举伐纣。周武王大军东出潼关，进至孟津，会合西南地区和江汉流域各国的军队渡过黄河，向朝歌进发。大军于公元前1027年周历二月初四夜到达距朝歌70里的牧野（今河南省淇县南）。当周军渡河向朝歌进发的消息传到商都后，纣王才赶忙策划应敌的措施。当时，商朝的军队远在东南战场，一时难以调回。纣王只好以在商都附近的少数奴隶主贵族的军队为骨干，并把大批奴隶和从东南战场抓来的战俘，匆忙地武装起来，拼凑了17万乌合之众，开赴牧野战场，以拒周军。决战一开始，周武王令吕望率领一部虎贲、戎车为前锋，从正面挑战，一面观察敌阵虚

^① 《中国军事史·兵略》上卷，第23页。



实。接着，指挥虎贲、戎车和徒兵配合的主力部队，猛冲商阵。在前阵的奴隶和战俘掉转矛头，倒戈冲击商奴隶主的贵族部队，为周军开路。商奴隶主的贵族部队拼死进行抵抗，死伤甚重。纣王的17万军队，一个早晨就“瓦解而走，土崩而下”，绝望的纣王逃回朝歌，登鹿台自焚而死。武王占领朝歌后，举行隆重的祭社典礼，宣告周人正式推翻商朝，建立西周王朝，从而结束了商朝600年的统治，姬发成为周王朝的开国之君。^①

^① 《中国军事史·兵略》上卷，第24—27页。

政治旗号可以掩盖战略图谋

(一)

公元前 1027 年，周武王推翻商朝，建立周朝。灭商后，周武王把获得的土地和俘虏，分给兄弟、亲戚、功臣和亲信，使他们成为诸侯，进行分区管理，成为周王室的屏蔽。正式建立分封制，周王是最高统治者，直接管理“王畿”，把与周王室血缘关系密切的亲族分封在距周较近的地区，以镐京（宗周，今陕西西安西南）为中心近畿周围的封国有：周、召、荀、虢、毕、芮、酆、毛、散国；洛邑（成周，今河南洛阳市）周围的封国有：卫、鲁、齐、晋、燕国。还在今河南、河北和山东地区分封了康、蔡、应、邢、曹等数十个诸侯国。封商殷投诚的微子启于宋（今河南商丘），重新扶植被殷灭掉的陈、杞、焦、祝等国，封一些异姓部族首领于秦、楚、徐、淮夷、肃慎、戎狄^①。

这些受分封的诸侯，拥有封土，世代相袭，可以在封土内修筑城池，组建军队，具有封土内的行政、军事和经济统治权。虽然封国有相对独立性，但必须拥戴周天子为共主。这样，在周王朝内形成与周有宗法关系而又相对独立的封国。同时，诸侯封其属下为卿大夫，卿大夫以下的士也被封予食地。周天子利用分封建立统治体系。上自天子，下至士，都是上一级对下一级的分封，下一级对上一级承担臣服、护卫、朝聘、贡赋等义务。由于周的统一建立在分封制基础上，因此是松散的统一。这种统一，在各封地经济交往少，分封国势力未坐大时，可以较好地维持；当一些诸侯国势力逐渐坐大，独立性逐渐增强，与周王室分庭抗礼时，就难以维持了。

随着时间的推移，各诸侯国为确保和扩大势力，必定要同接壤的封国展开争夺土地的斗争。争夺一开始就不平等。诸侯国分封时势力范围就有大小、优劣之别，加上诸侯国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一些封国领先强大起来，独立性越来越大。周王室的势力却没有明显增长，天子和诸侯的力量对比发生变化，天子号令诸侯也就困难了。周王朝后期日渐衰落。周朝从公元前 1027 年到前 770 年经 257 年发展，结束了西周时期。周平王元年（公元前 770 年），因受戎狄侵扰，周平王放弃镐京，迁往东都洛邑。此后为东周，前期为“春秋”，后期为“战国”。

^①《中国古代史》上卷，人民出版社 1979 年版，第 61—65 页。



东迁之后，周王室直接控制的王畿面积缩小一多半，军力减少三分之二，周天子已徒有虚名，周王的号令已无人听从。郑、齐、晋、秦、楚等诸侯国先后强大起来；蛮、夷、戎、狄等部族也有了较大发展，并向中原扩展势力，对华夏族各国构成很大威胁。强国为扩张势力相互争斗，兼并和争霸战争不可避免。

(二)

春秋争霸战争的序幕是由郑庄公拉开的。郑庄公的称霸战争虽然是短暂的，但在争霸中的战略行动和战绩，勾勒出春秋争霸战争的战略轮廓，获得了争霸战争战略指导的经验教训。高锐说：

郑国地处中原，国势强盛，郑庄公担任周卿士要职。郑庄公利用其地位、国势和其他强国受困于国内事务之机，打着周王旗号，对宋、卫开展攻势。自鲁隐公元年至桓公十年（公元前722—前702年）的20年间，郑积极联络诸侯，先盟邾于翼，又修旧于齐，再结好于鲁，不仅使宋、卫陷于军事和外交上的孤立，而且形成了对宋、卫的东西夹击的战略态势。尔后又在齐、鲁、虢之师配合下使两个小国完全屈服。随着郑国霸主地位逐渐确立，周、郑矛盾尖锐起来，终于爆发了战争，郑战胜了王师，并使卫国屈服。后又大败戎师，俨然成了重振华夏的带头人。但郑国国力毕竟有限，尤其在郑庄公死后，又遇上长达20余年的内乱，很快失去了诸侯之首的资格。^①

郑庄公称霸证明，强国善于打出政治旗号，在诸侯国中就有地位，能抓住历史机遇，善于结成军事联盟，就能赢得争霸战争；在诸侯国林立，强国众多和外族势力较大的形势下，一个强国很难统一天下，即使称霸也难以长久。在郑国霸主地位丧失的同时，齐国的国力迅速增强，并远胜郑国。关于齐桓公进行争霸战争前的战略形势，郭汝瑰说：

郑、卫、鲁、宋诸国处于四战之地，领土狭小，没有发展余地，而且相互削弱，不能成为大国。燕国远离中原，单独存在于北方，国力不强，不能单独对抗戎族。秦国（在今陕西省）兼并了周围一些戎族部落，扩大了领土。晋国吞并了霍、魏、耿等国家和北狄一些部落，成了一个比较大的国家。虽然秦、晋两国与夷狄杂处，民性强悍，崇尚武勇，而且地处中原边缘，有较大的发展余地，但秦生产落后，晋内乱不已，亦不能阻止戎狄的侵扰，夷狄的势力进一步发展起来了。东周、燕、邢、卫、齐、鲁、宋诸国都受其扰乱；在今湖北境内的南蛮逐渐强大起来，进出中原，灭了申、息等国，给中原诸侯国

^① 《中国军事史略》上卷，第103—104页。

以极大的威胁。当时，秦、晋两国国力远不如齐国，楚国国力亦未达到与齐国势均力敌的程度。所以领导并联合中原诸国共同对敌的责任，历史地落在齐国身上。^①

(三)

周庄王五十二年（公元前685年），齐桓公即位，任用管仲执掌国政。虽然齐国地方千里，土地肥沃，宜于农耕，滨海之区，富渔盐之利，国内形势好于其他强国，但是由于诸侯国林立，强国不断出现，戎、狄、蛮、夷的威胁，齐国没有强大到独自一统天下的程度。齐国既不能与所有国家为敌，也不能独自抵御外族，却能称霸诸侯，作为中原盟主，联合一些国家，共同诛伐无道的大国和抵御外族的侵扰，建立由齐国主导的社会秩序。齐桓公和管仲正是由此出发作出战略决策。郭汝瑰说：

管仲初见齐桓公时就提出“君霸王，社稷定”的主张，但齐桓公无意建立王业，勉强同意图谋霸业。管仲知道，地大富，人众兵强，是建立霸业的根本。同时管仲还认为“诸侯合则强，孤则弱”，主张尊王攘夷。管仲以实力为后盾，打出尊王攘夷的旗号，以同盟为手段而图霸中原。《史记》有如下两段记载：“桓公既得管仲，与鲍叔、隰朋修齐国之政，连五家之兵，设轻重鱼盐之利，以赡贫穷、禄贤能，齐人皆悦”；“管仲既用，任政于齐，齐桓公以霸，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管仲之谋也”。^②

齐桓公、管仲一开始就打出“尊王攘夷”的政治旗号，以图建立政治、军事联盟，对其他强国和外族形成以强对弱、以多对少的优势，并长久保持优势地位，称霸天下。

齐桓公和管仲在总的战略下，建立霸业。齐国率先实行改革，整顿行政和军队。把国都以内分为二十一乡，其中商、工之乡六，士乡十五；把郊外的地方分成五属，属下有县，县下有乡，乡下有本，本下有邑，邑下有家；士、农、工、商不杂处；工商之乡和属不服兵役，把服兵役的士乡十五分为三，五乡为一军，共三军，每军一万，即所谓“参其国”^③。这种寄军令于内政的兵农合一体制，使其集中居住，互相熟识，从而形成了“行同和，死同衰”的作战整体，加强了军事力量。管仲还鼓励开垦土地，按土地好坏分别收税，调动了劳动者的积极性，农业得到迅速发展。这些重要改革措施，使齐国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得到迅速发展和加强，国富兵强为齐国称霸诸侯奠定了

^① 《中国军事史·兵略》上卷，第38—39页。

^② 《中国军事史·兵略》上卷，第40—41页。

^③ 《中国古代史》上卷，第89—90页。